



第八辑

苏联问题译丛

一九八一年 第一辑

35

苏联问题译丛

(第八辑)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苏联问题译丛

(第八辑)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15,000 字

1981 年 3 月第 1 版 198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书号 17002·51 定价 0.85 元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政 治

- 国际上对苏联社会性质的看法**.....(1)
- 斯大林的反“右倾”斗争.....〔苏〕罗伊·麦德维杰夫(23)
- 苏联权贵人物的继承与更迭〔美〕塞沃林·比阿勒(46)
- 变革之友与变革之敌——苏联的改良主义与
保守主义.....〔美〕斯蒂芬·F·科恩(73)

经 济

- 科学与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基础**.....〔苏〕K·塔克希尔(98)
- 刺激科学技术进步的财政信贷杠杆.....〔苏〕Г·列别杰夫(115)
- 科学技术进步的法律问题.....〔苏〕E·托尔卡诺夫斯基(129)
- 苏联电机工业部改进科技管理的试验
- 技术进步的经济**.....〔苏〕A·安东诺夫(140)
- 电机工业部科技管理的经济**
- 试验**.....〔苏〕E·阿斯塔弗耶夫(144)
- 科学技术进步的经济刺激办法**.....〔苏〕П·谢德洛夫(163)
- 组成生产集约化〔苏〕A·巴拉诺夫(177)
- 建筑单位的工人干部〔苏〕Ю·巴克(195)

国 际

八十年代苏美关系展望〔美〕R·斯塔尔(211)

苏联和西欧小国的经济关系

.....〔苏〕IO·安德烈耶夫、A·阿斯塔波维奇等(230)

苏联同芬兰的对外贸易(242)

苏联同瑞典的对外贸易(245)

苏联同丹麦的对外贸易(250)

苏联同挪威的对外贸易(254)

苏联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对外贸易(258)

苏联同奥地利的对外贸易(264)

苏联同西欧小国的经济合作、生产合作和科技合作(269)

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和阿富汗问题

.....〔日〕佐久间邦夫(277)

军 事

苏联的军费开支和三种常用的计算方法

.....〔西德〕迪特尔·斯·卢茨(285)

苏联海军的能力〔美〕戴维·B·卡辛(302)

苏联日益庞大的化学战武库〔美〕约翰·埃里克森(315)

苏联有“军界工业界集团”吗？

.....〔西德〕艾格伯特·雅恩(323)

国际上对苏联社会性质的看法

编者按：苏联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和东西方学者对苏联社会的性质提出了各种意见的探讨：有的认为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有的说苏联实行的是—种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制度；有的认为苏联是一个过渡性社会。这份资料主要是收集和整理这些方面的各种观点，供研究参考。

一、南共联盟

南共联盟把苏联的社会看作是一种“畸形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或“国家集权主义”。南共理论界人士有时概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①。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畸形发展的主客观原因是复杂的，就其主观因素来说，主要是由于斯大林的统治。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采取

① 国家社会主义的英文为 state socialism，其中state—字指国家政权、国家机器，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m 中 nation—字指民族者不同，应加区别。——编译者注

“非斯大林化”的步骤是“必要的”，消除了“若干畸形现象”，但只是“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迷信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因而没有“根本的改变”。有的人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为“后斯大林主义”。

南共联盟的基本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苏联实行“国家所有制”，但这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低形式”

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家所有制”。然而，这种国家所有制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低形式”，它仍然“把工人阶级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分离开来”。“国家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并不就是工人所有”，生产资料是掌握在官僚国家机构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工人们手里”。工人和国家之间实质上存在着一种“雇佣关系”。

铁托在一九五〇年就批评苏联的国家所有制。他说：在十月革命三十年后，“生产资料却依然留在国家手中。……工人对工厂管理，依然没有发言权。……工人只有劳动的可能性和权利，……这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地位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苏联的领袖们到现在还没有采取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特点的措施，即把工厂和其他经济企业交给工人，使他们自己来管理这些工厂和企业”。

二、苏联用国家计划和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把工人阶级排除在生产和分配的管理之外

这种制度不是用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而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忽视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它终究要同客观经济规律“发生冲突”，遭到经

济规律的“无情的报复”，以至引起“经济的停滞和倒退”。同时，这种制度取消了“劳动者、企业和其他社会经济单位的必要程度的独立性”，压制了它们的“主动性”，并使权力日益集中在行政官僚机构的手里。在分配方面，苏联的工人阶级“一直没有掌握分配，即没有干预剩余劳动的分配”。“全部剩余劳动（集体农庄的一部分除外）都归国家占有。具体地说，全部剩余劳动同直接生产者分离，苏联的官僚系统决定它的使用并用它来满足自己的奢侈的要求”。

三、苏联存在一个庞大的“官僚制度”，实行“官僚专政”，并造成了“个人迷信”

苏联的情况表明，“仅仅通过国家机器管理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会导致管理的日益集中、国家和党的机构日益紧密结合，导致国家和党的机构的加强并使之成为一个超社会的独立力量”。在这样的基础上，就会产生“官僚国家主义偏向”，“使这些机构不为社会服务，而成为社会的主人”。“斯大林统治的特征是蔑视和无视劳动人民的作用、要求和愿望，……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建立和加强一个官僚主义的机器”。这种做法使得苏联的政治制度“畸形发展”，成为一种“官僚主义的国家极权主义”制度。列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常常提醒人们注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建立“劳动者的政权，而不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政权”。列宁认为，苏维埃民主制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但要实现这种民主制，“必须真正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工作，从而防止官僚主义地去理解政权，防止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了“党本身的专政”，更确切些说，搞成了“党的上层人物和政权机构的

专政”。苏联的“个人迷信并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而是一定制度的合乎逻辑的产物”。苏联的国家极权主义制度造成了“个人迷信”，同时“个人迷信”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制度。

四、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思想垄断”

苏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的科学原理进行了实用主义的修正”，使它变成了“陈腐的教条”，“以此来迎合一定的实际的暂时需要”。在苏联，“一切主要的精神创作的领域，都有了自己的官方理论”，“全部历史也得到……那种官方的解释”。中央委员会的指令“成为文化和科学的创作与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框子”，“人们不敢超越主要是政治首脑宣布的论点和立场”。“最高的政治人物便成了最高的万能专家”，斯大林成了“独断地决定‘真理’而任何人不敢检验的‘大圣人’”。这种“思想垄断”的统治“排斥了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态度分析现实的可能性”。苏联力图在国际共运中，“尤其是在思想领域内占据垄断地位”，而把那些“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诚努力，都斥之为修正主义”。

五、苏联的“国家极权主义”在对外方面表现为“霸权主义”

苏联在国际共运中以“领导中心”、“领导党”自居，力图“使自己的政治观点成为一切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遵循和不能触犯的观点”，并把各国共产党“变成它的对外政策的工具”。它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普遍规律”，就是要对外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在国际共运中建立“等级关系”，要世界上的共产党“对一个党忠诚”，按“一个模子”来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

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黑兰、雅尔塔、莫斯科和柏林会议上解决国际问题时，采取了“帝国主义的立场”，同西方大国划分势力范围。

南苏两党恢复正常关系后，南共一般不直接点名批评苏联，而是强调反对“大国和集团争夺”，反对“霸权主义”。他们虽然使用这种笼统的措辞，但其实际内容已越来越多地指向苏联。

南共理论界人士曾谈到，造成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苏联国内的“极权官僚主义的强有力因素”在起作用，使它“走上了旧沙皇俄国的道路，走上了大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道路，……同时力图用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来掩盖这一点”，“霸权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外部表现”。他们指出：列宁意识到“在霸权和战争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隶属于自己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利益，同样可能犯错误”，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不排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说这种“相互的战争冲突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冲突的终点”。卡德尔在一九七九年发表的《自治的发展是不结盟的泉源》一文中进一步说：“历史证实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见：革命胜利本身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自动消失，也不意味着列宁所说的‘骑在别人头上’的倾向会自动消失”。

在南共联盟看来，苏联自吹自擂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带有多种变态、不自由、异化和不民主的关系和行动的社会”，“存在这么多的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在那里有“一系列

最触目的现象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性质”。

(南共六大、七大、十大、十一大文件；铁托的几次讲话；卡德尔：《论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自治的发展是不结盟的泉源》；弗兰茨基：《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二、“欧洲共产主义”

(一)西班牙共产党

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有一个“官僚阶层”，但“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西共总书记卡里略和西共中央执委会常委、党刊主编阿斯卡拉特认为，“在苏联出现的国家已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不保护私有制，但也不是列宁所设想的劳动者直接行使权力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国家”。苏联实行的是“斯大林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苏联在字面上写着“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而实际情况却意味着劳动群众“仍然缺乏自由，仍然被撇在一边，在某些方面甚至仍然受压迫”。这个国家已“变成由一小撮人掌握权力的专制国家”。

卡里略在《“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中对苏联的统治集团作了一些分析。他说：苏联“不仅保留了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而且竟然出现了以前只能设想在帝国主义国家才会发生的种种畸形和退化的现象”。列宁逝世后，“发展了一个官僚阶层”，“它逐步包揽了各种领导职能”，并“认为自己承担着工人阶级的社会使命，自以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这一阶层“渐渐根深蒂固，渐渐具有了自身的利益”。苏联“这个国家

已不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从这一意义上说，官僚阶层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阶级”。官僚阶层“并无私有财产，从苏联企业中抽出一部分剩余价值以维持这一阶层，但肯定比维持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少”。但是，这一阶层“拥有不受阻挡的并且几乎是无人监督的政治权力”，“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甚至凌驾于党（党是服从它的）之上，决定和处理一切”。

（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阿斯卡拉特：

《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

（二）意大利共产党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行“官僚集中制”

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以后，意共强调不能把苏联发生的问题仅仅归因于斯大林个人的缺点，而且应从政权的“制度”或“体制”方面寻找“病根”。

意共已故总书记陶里亚蒂就曾指出：列宁“在他最后的演说和著作中曾强调产生威胁新社会的官僚主义化的危险”。苏联的“党、国家机构、工会，特别是最重要的地方组织的官僚主义化，阻碍、限制和压制了党内的创造性思想以及群众的积极性，也阻碍、限制和压制了国家的民主机能和全社会的建设热忱的发挥”。“斯大林的错误同苏联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也许首先是整个党的生活中各个官僚机构的分量过分增长有关”，两者“逐渐转化而互为表现形式”。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在一九七八年的一次谈话中批评苏联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他说：列宁并没有“把民主集中制看作是压制党内自由的准则，

而是把它看作是保证党内民主辩论充分开展的准则”，通过民主辩论，“在自由地和民主地表达了各种不同的主张之后，多数人的主张合理地成为全党的主张”，这是“使党得以卓有成效地，也就是团结一致、有纪律地进行活动的基本条件”。列宁去世后，“民主集中制退化了，先是变为‘组织集中制’，以后又变为‘官僚集中制’，而这些同列宁所设想和实行的那种民主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

（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答《新议论》杂志；贝林格一九七八年答意《共和国报》社长问）

（三）法国共产党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生产资料还不是工人所有。法共总书记马歇和法共主办的《新评论》杂志社社长弗·科恩等人认为：苏联不存在剥削阶级和有产阶级，“没有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问题，但存在官僚主义”。斯大林时期发展起来的“官僚主义、极权主义的领导现象”现在“继续存在”。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揭发了对社会主义法制、列宁主义准则的破坏，而这两次大会后“未见作出多少走向真正民主的有效努力”。苏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是工人所有，“工人仍处于出卖劳动力的地位”，因而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漠不关心”。苏联的现实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在走向工人自治方面的迟缓”，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根本问题”是要“工人管理生产资料”和“改变社会关系”。

（马歇：《让我们说老实话》，1977年；

科恩等：《苏联与我们》，1978年）

三、苏、捷、德的持不同政见者

(一) 罗伊·麦德维杰夫

原苏共党员，历史学家，一九七五年在莫斯科创办的私下出版物《二十纪》的主编。他主张在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使苏联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实行深刻的全面的民主化”，认为今天的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官僚化的社会主义”。

一、苏联主要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六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不彻底

苏联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但“进行得很慢而且不够彻底”。“在很多情况下，同经济手段相比，行政领导方法仍占优势”。同时，“在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军需品生产和日用消费品生产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

二、苏联缺乏社会主义民主

“今天的苏联社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仍然是很落后的”。“政治制度还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国家和党的管理形式和方法仍保留着十分浓厚的寡头政治的因素，……在所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中，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因素仍很顽强。……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选举都带有形式主义的性质。……党的领导机关（区委以上）的选举也带有这种形式主义的性质”。“工人、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这些基本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仍是微乎其微的”。在干部政策方面，一个“领导职务的候选人的才能还不如友好关系、熟人、对个人

的忠诚和老上下级关系、亲属关系、纯洁的民族出身或者某种偶然的情况和巧合更有意义”。“在我们的管理机构中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在这里都有‘自己人’担任领导。在机关中人们称这些人是‘某某的人’”。

三、苏联存在一个官僚阶层，但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不能否认，高级官僚在我们这里已形成一定的阶层或者甚至是人们当中拥有一定规章、习惯、自己的社会心理的等级。这个阶层和某些其他阶层一样，并不构成特殊的阶级，但拥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和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活动方式有联系的特点”。官僚阶层并“不是一个社会经济含义的阶级”。“诚然，我国领导人的权力是很大的，它常常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同类官员的权力”。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

（二）瓦尔加的“遗言”

瓦尔加的“遗言”，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及其结果》。有人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苏联某一派持不同政见者所写而用瓦尔加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没有说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认为那里存在官僚主义专制制度。

一、苏联党的官僚化是在斯大林时期发展起来的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俄国由于当时的国内外条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斯大林掌权后，“党自己走上了官僚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变成一个庞大的、等级森严的、以服从为基础的官僚主义专制制度。……在这种等级制度中，宗派思想、向上爬、拍领导人马屁等恶劣作风迅速蔓延开来”。

“三十年代以来，斯大林个人已越来越代表不了无产阶级政党，他代表的是统治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官僚主义政权”。

二、统治苏联的是“党的官僚上层”

党的官僚上层“掌管企业、机关和整个经济部门，操纵政治、文化、日常生活和国家的内外关系，掌握全党及其领导机关和组织活动”。“这些人有发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告、命令和规章制度的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它有权指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党的官僚上层享有无限的权力，……这种无限的权力就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结构。马克思和列宁从理论上确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变成了党的官僚上层的专政”。“这种专政很容易被滥用”。在意识形态方面，“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不受检验，也不允许批评……变成一种官方的、绝对的教条”。

三、苏联的高级干部享有特权

“‘高干名册’上的干部享有与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相对立的特权地位。……他们的活动不受社会，也不受党的监督，……”。这个统治阶层“竭力用物质特权来补充和巩固他们非公开的、但在法律上已固定下来的特殊地位”，“通过行政管理权扩大他们的特殊待遇”。“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际上早已被践踏了。……无疑，列入‘高干名册’的那些人及其家属之所以能生活得极为富裕，是因为他们借助某些规定把一部分社会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他们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招牌下掩盖了对工人和职员，首先是对集体农庄庄员的无情剥削，并从这种剥削关系中

不断获得物质利益。”

四、苏联的官僚化政治制度难以改变

斯大林死后，“苏维埃俄国的社会生活似乎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法律义务似乎又重新被尊重了，完全无辜的人们似乎不能再被打成‘人民的敌人’，……然而，我国社会生活的组织改变了吗？这个问题只能得到否定的回答。”“这个国家的管理原则之所以不可能改变是有其内在和外部原因的。首要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建立和培养起来的党的官僚上层不可能放弃他们无限的、不受监督的、不负任何责任的个人权力，……更不可能放弃他们在法律上和物质上享有的特权。”“外部原因是美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和特别具有侵略性的力量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

（《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及其结果》）

（三）耶戈洛夫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的看法是：

一、苏联的国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在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所有制很容易变成虚假的社会所有制，变成在实际内容上是党和国家机器的所有制”。“只有当每个社会成员实际上有权对管理和使用社会财产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权决定这些财产用于什么目的和怎样分配时，只有当每个社会成员……有权选出和撤换这些财产的管理人员，并有权批评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每一个国家官员，而且不会因此受到迫害时，这个所有制才是全民所有